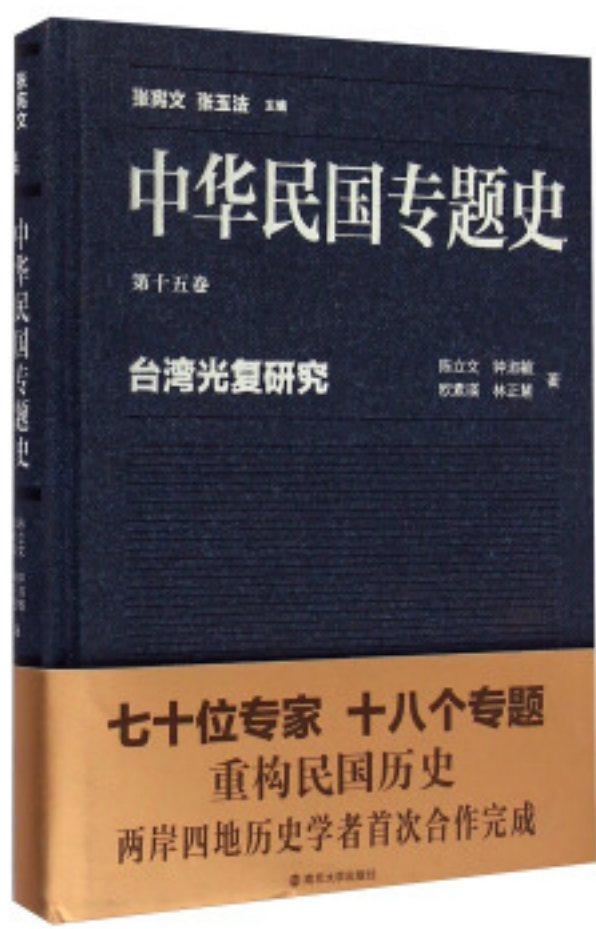


#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五卷：台湾光复研究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五卷：台湾光复研究\\_下载链接1](#)

著者:陈立文，钟淑敏，欧素瑛，林正慧 著，张宪文，张玉法 编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五卷：台湾光复研究\\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了解民国史的必读，权威之著

-----  
送货快 质量好

-----  
台湾光复受降典礼出席人数此书说一百多人，别的说二百多人？

-----  
很经典的书，我要半年读完全套。

-----  
好书，不错，好好学习，天天挣钱。好书，不错，好好学习，天天挣钱。

-----  
值得研究.....

-----  
还好。

-----  
中华民国专题史编辑  
本词条缺少信息栏，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  
中华民国专题史是由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张宪文和台湾著名史学家张玉法，策划统筹组织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四地70余名学者，历时五年，编著而成，总计18卷，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发行，随后也将在台湾发行繁体版。[1] 目录 1书籍概况 2书籍意义  
1书籍概况 编辑  
张宪文介绍，这是两岸及香港、澳门史学家首次大型合作研究项目，该丛书涵盖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要时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军事、城市及边疆与民族等议题，内容全面，体系宏大。  
谈起这套书，张宪文先生感慨颇深，“虽然编著中还有一些分歧，但不影响双方的学术合作，仍可以在合作中求同化异，求同存异”，他表示，将真实的历史展现给两岸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学者的时代责任。[1] 中华民国专题史 中华民国专题史 2书籍意义 编辑  
“此次编写中，台湾地区的学者占了将近一半，这是史无前例的”，张玉法如是认为，在民国史的研究上，这套书基本上是保持中立的，不去论断是非，而仅仅是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  
“其中，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国共关系，国共关系对错不好说，所以我跟张宪文先生商定的一个原则，就是基本上不论谁对谁错，只是说谁做了什么事情，把它写出来。”  
张玉法坦言，两岸研究民国史的学者，这些年来对国共关系以外的题目，基本上都是凭史料说话，大多没有什么分歧。[1] 中新社南京4月20日电  
(盛捷)由两岸及香港、澳门70位历史学家协作研究、合作编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简体版20日在南京发布。  
“197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开始重视民国史研究，起初大陆和台湾对民国史的认识分

歧很大，但是经过二十余年两岸历史学者的学术来往和交流，对民国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观点渐趋一致”，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张宪文分析道。

因此，张宪文和台湾著名史学家张玉法，策划统筹组织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四地70余名学者，历时五年，编著了这部《中华民国专题史》，总计18卷，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发行，随后也将在台湾发行繁体版。

张宪文介绍，这是两岸及香港、澳门史学家首次大型合作研究项目，该丛书涵盖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要时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军事、城市及边疆与民族等议题，内容全面，体系宏大。

谈起这套书，张宪文先生感慨颇深，“虽然编著中还有一些分歧，但不影响双方的学术合作，仍可以在合作中求同化异，求同存异”，他表示，将真实的历史展现给两岸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学者的时代责任。

“此次编写中，台湾地区的学者占了将近一半，这是史无前例的”，张玉法如是认为，在民国史的研究上，这套书基本上是保持中立的，不去论断是非，而仅仅是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

“其中，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国共关系，国共关系对错不好说，所以我跟张宪文先生商定的一个原则，就是基本上不论谁对谁错，只是说谁做了什么事情，把它写出来。”张玉法坦言，两岸研究民国史的学者，这些年来对国共关系以外的题目，基本上都是凭史料说话，大多没有什么分歧。

---

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9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1]日后，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

借助于报纸公告、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获得信息的三校学生纷纷历尽艰险，赶往长沙报到。1937年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上午九点，响起了空袭警报，师生并未逃避，校史上加了个括号“实在也无处可躲”[2]。作者的本意是，当时尚未来得及挖防空洞；我则理解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故师生们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走进教室。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就在这连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3]一、战火摧不垮中国大学

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据史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4]。具体到某著名大学，情况尤其明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员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5]。中央大学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6]。唯独声名最为显赫的西南联大，因系三校合一，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样以1944年度为例，西南联大各类学生加起来，不过2058名，至于教职员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数量上远不及中央大学[7]。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三分之二。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均为国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一样，单看这两组数字，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8]。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最早关注这一重大现象并作出详细调查的，是1941年10月25日《解放日报》所刊《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

成都（川西）区（学生约6500人）：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中央技艺专校、西康技艺专校（以上国立）、金陵大学、金陵女院、朝阳学院、光华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以上私立）；重庆（川东）区（学生约7000人）：中央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药学专校（以上国立）、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以上省立）、复旦大学（筹改国立）、私立中华大学等；昆明（云南）区（学生约4500人）：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云南大学、中正医学院、艺术专校、国术体育专校等（均国立）；贵阳（贵州）区（学生约4000人）：浙江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贵阳医学院（以上国立）、湘雅医学院、大夏大学（以上私立）等；西北区（学生约5000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技艺专校（以上国立）、山西大学（省立）等；两广区（学生约4000人）：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以上国立）、江苏教育学院、广东文理学院（以上省立）、华中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勤勤学院（以上私立）等；湘西区（学生约1100人）：湖南大学、师范学院、商业专校（以上国立）、民国学院（私立）；上海区（学生约7400人，注：伪校不在内）：交通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以上国立）、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分校）、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大同大学、上海法政、上海美专、南通学院等，以及抗战后新成立之太炎文学院、达仁学院、新中国大学等十余校（均私立）；北平区（学生约2500人，注：伪校不在内）：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协和医学院、铁路专校（以上私立）、中法大学（中法合办）。其他地区（学生约3000人）：如分散在福建之国立厦门大学、私立协和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浙江之国立英士大学、省立医专；江西之国立中正大学、苏皖政治学院；河南之省立河南大学等。

附注：一、各地区主要专科以上学校均已列入。有“等”字者即尚有少数未列入。二、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学迁重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的民众相互之间的了解太少了，特别是对于日本对于台湾的殖民统治带来的影响，我们研究得还远远不够。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五卷：台湾光复研究\\_下载链接1](#)

书评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五卷：台湾光复研究\\_下载链接1](#)